书评·动态

执着于“人脉”的考察：再现清末新式社团史的可贵努力

——读《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韦学恩

历史一度被简单化了。对已有的结论不存质疑，把需要质疑的结论当作研究新问题不验自明的前提；对材料的使用满足于二手的甚至是三手的；对历史的认识单一化、模式化，久已成为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界所不满的恶疾。可喜的是，这些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反思。他们正尝试着从各种角度、用各种方法自觉探索着“求真”的良途，以期修正往日简单化的结论，再现“复杂”的历史。桑兵教授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三联书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让我有幸看到了作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对晚清政治格局中社团组织的研究并不是桑兵的首创，他只是将探讨的对象集中于世纪之交的留日学生及新学之士，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相对来说被忽略了的一些社团组织予以应有的重视。在史学研究上，这当然都是值得肯定之处，但仅此还不足以完全体现作者再现历史复杂性的努力和成效。二十世纪初叶出现的新式社团组织大多结构松散，维持周期短，思想性质不明确，如果采用对其组织概貌、思想渊源、性质特点、活动功能进行逐项分析的程式化方法，就会在研究路径上设置障碍。对此，桑兵另辟蹊径，以“人脉”为主线，围绕人事活动来展开，探讨了兴汉会、保皇会、正气会、中国议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等社团组织及其活动。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内忧外患下，在中西碰撞中，固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群体间的流动、交错互渗也出现了新的走向，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集团开始裂变与重新聚合。在这种情况下，新知识界与各种政治势力、军事势力、包括秘密会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他们创建了自己的社团，开展了自己的活动。他们之间的联合共事固然不全是出于共同的理想信仰，他们之间的分歧冲突也不尽是因为不同的政治宗旨，这中间更多的是利害计较和人事纠葛。与秘密会党的联络是这一时期成立的社团的突出特点之一。秘密会党的兴起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人员组成复杂，主要是社会游民，包括破产农民、运输工人、船民、水手以及散兵游勇等。组织结构也多是家族血缘制的摹拟，通过结义关系联结，有江湖习气。因此，往往个人的影响力就对他们的去向起很大作用。就拿哥老会来说，如果没有毕永年这一层关系，很难说会有与兴中会、三合会联合组成兴汉会的结果。

[收稿日期] 2000—09—24

[作者简介] 韦学恩（1976—），女，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硕士生；北京 100872

同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历史人物的言行也带有过渡性特征，并非一成不变。所谓的新知识群体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主要是由旧式知识分子转化而来，有一个心路发展历程。他们既被西方近代意识所驱动，又受到传统观念及规范的制约，这并非传统的保守、维新与保皇、革命的政治两分框架所能涵盖的。在结社活动中，一些骨干成员往往与多种势力都有纠葛，在几个团体中都扮演主要角色。如在正气会和中国议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汪康年，在戊戌前与康有为、梁启超志同道合，在勤王运动中又曾游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清朝大员，还与孙中山及兴中会有过交往和联系。中国议会议长容闳更是同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江浙士绅叶瀚先后担任过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书记、中国教育会温和派领袖。人事的复杂反映在组织上就是前后不尽一致的宗旨原则和灵活多变的策略方针。"中国议会不仅准备暗中动武，而且力图变政自立"（第96页)。保皇会也曾频频采取暗杀活动。因此，不能仅凭一人一事、一言一行就对社团加以分类定性。在反清政变共识下的各有打算使不同社团之间、同一社团内部都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面目。作者以"人脉'为主线，不仅可以理顺种种夹杂不清的关系，还可以透过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考察团体间的互动及其群体意识的形成，乃至对清末政治格局的影响，如庚子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大联合。把社团的产生渊源、性质特征及其功能作用定位于动态关系间，把对历史事件的考察放在动态过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再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诚如作者所言："历史本身的丰富生动，远比一般概念更能显示过程与结局间既紊合又矛盾的魅力。"（第266页）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等级制度和宗法精神贯穿于社会结构的一切领域，它的实质反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近代社会虽然开始呈现出等级失序的状态，但传统的重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却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1901－1904年间出现的这些新式社团又是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成立起来的，因此它们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努力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人事上的争取和人际间的互动，在这种努力中，个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凸现出来。说到底，个体行动者是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社会要素。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的不同创造共同塑成了面目复杂的历史。作者对"人脉"的考察不仅再现了这种历史的复杂性，而且让创造了历史又被"历史"掩没了的人重见天日，这种以人物研究丰富历史研究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历史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摆正人的位置？如何摆正作为个体的而非集合的人的位置？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加以反思的问题。

如果说"人脉"的切入角度有助于作者达到再现"复杂"历史的目的，那么，在对待史料上的严谨考实态度，则体现了其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做的努力。作者从对原始材料的认真解读中发现被"历史"掩没了的东西；在对不同来源史料的比较中考证已有结论，得出新结论。书中作者对历史细节的考订可谓不胜枚举。如在"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问题上，作者考订的结果认为，1896年的一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只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的措施而已，算不得真正的留学。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应定于1897或1898年，从而为进一步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依据。又如，作者对1903年清国留学生会馆排满演说的时间、与会人数、演说的策动者和反对者等问题重新作了考订，矫正了满族学生长福这一长期以来被扭曲了的历史人物形象，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些误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大胆质疑了"同盟会是团体联合"这一学界似乎早已无庸质疑的所谓"定论"，沿着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国内学界风潮两条主线，在孙中山与国内、国外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中考察了同盟会的成立，从而否定了同盟会是团体联合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多数会员的作用。

作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证努力，来淡化以往近代史研究中动辄简单化定性归类的不良惯势，真正突破以意识形态附会历史的僵化做

法，不再“以论代史”地将历史程式化。这当然不是否认对历史结论和历史规律的探讨，而是表明从多侧面、多视角、多维度恢复历史复杂面目的必要，强调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主要因素和本质规律，考察这些因素和规律是如何在具体历史中以具体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样，就能尽可能作到“从中发现和揭示的是历史固有的内在联系，而非外部强加的架构”（第4页）。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的此种自觉努力也无非是谋求史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致力于对本真的追求，从而确立史学的独特认识价值。当今不同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向，历史学的功能也不断被其他社会人文科学所分解和化合。而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通过求真的努力，再现真实的历史，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持作用。因此，桑兵以构建大厦的砌砖功夫所作的此种可贵努力，是值得赞赏的。如果每一个致力于史学研究的人都认真做好砌砖功夫，何愁大厦不会稳固？

当然，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缺。它对新知识界社团组织及活动的探讨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史视野，但却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强调的是其政治活动对清末政治格局的影响，而对于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社团的文化使命及其如何对社会转型特别是学术文化转型产生作用，则鲜有论及。或许，这与作者曾经作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并出版过专著（如《清末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从而有意回避某些探讨有关。但其实这两者之间仍有区别。我以为，此种缺憾，多少还是影响了作者对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活动及其社会效应作出的整体揭示和宏观把握。

(上接第110页)
依据大量翔实的文献、洪门秘籍和档案资料以及实地考察，否定了洪门是清初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于康熙年间创立的传统说法，确认洪门乃是乾隆二十六年由福建漳浦僧洪二和尚万提喜所创立。针对1993年以来，许多学者根据罗炤先生在福建诏安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和在福建东山县发现的《香花僧秘典》(实为香花僧超度亡灵时的手册)，再次提出洪门是万五道宗于康熙甲寅年创立的看法，在本书再版时，作者把针对上述观点的论文《“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之我见》附于书后，作为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争鸣的继续。

以往许多学者受到帮会中人著作中有关“洪门、汉留（哥老会）同出一源”说的影响，把洪门（天地会）与红帮（哥老会）这两个不同的秘密结社相混淆。本书作者认为，洪门(天地会）与红帮（哥老会）虽然在晚清时期开始融合，帮会中人也把二者说成同一组织，但是，从历史事实上看，洪门天地会始于乾隆中叶的福建，而红帮哥老会则是四川长江上木帆船水手中的“啯噜”，在同其他秘密结社融合后，于咸同年间才正式形成。

三、此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天地会自创立以来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对天地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均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价。洪门创立以后，在国内多次起义反清。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在两广及上海和厦门等地均建立过军事性政权，既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也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了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洪门成为革命党人依靠的重要力量，海外洪门则以辛勤劳动所得，用来支援国内革命。民国以后，洪门发生分化，一部分走上革命道路，一部分演变为黑社会。应当说，洪门的历史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其落后、消极的一面。

此次再版增补了不少内容，特别是上海小刀会、闽南小刀会、海外洪门等章节，都有重要补充。